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Taking the Contribution of Qian Xuantong and Lin Shu as an Example

Ya'na Zh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o awaken the people and spread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ideas, Hu Shi and Chen Duxiu et al. raised high the banner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n the journal of *New Youth* to advocate vernacular and oppose classical Chinese. The supporters led by Qian Xuantong and Liu Banno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vernacular Chinese. Qian Xuantong actively joined in the debate, not only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vernacular Chinese, he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vision rul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form. Lin Shu, who was then called the final guard of ancient Chinese, published articles to oppose a complete abandon of ancient Chinese, because of which he was laughed and targeted at. Therefore, Lin Shu was seen as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e faction, and heated written polemics follow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cholars. Objectively speaking, Lin Shu has made certain indirect contribution in expanding and popularizing modern Chinese, which should not be denied because of the previous polemics.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analyze the promotion of New Cultura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s, taking the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Qian Xuantong and Lin Shu respectively from the two opposite groups.

Keywords

New Cultural Movement; Qian Xuantong; Lin Shu; Vernacular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Construction

新文化运动对汉语言建构的影响——以钱玄同和林纾的贡献为例

张雅娜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

为唤醒民众、传播民主共和思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1917年在《新青年》上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钱玄同和刘半农引领的支持派积极投入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钱玄同积极地参与论争,不但为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提出了理论依据,他还身体力行地在文字改革实践中参与修改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被称为古文最后守夜人的林纾发文反对完全废弃文言文,受到来自白话文阵营的嘲笑和攻击,林纾被视为反对派的领袖,双方曾经进行过激烈的笔战。客观地讲,林纾对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也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间接的,不应因曾经的论战而否定他的贡献。本文尝试从双方阵营选取代表人物钱玄同和林纾来阐释新文化运动对汉语言建构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钱玄同 林纾 白话文 汉语言建构

1 引言

一战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强烈,中国民族资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五四”翻译文学的汉语建构作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YJJCZH067)。

【作者简介】张雅娜(1974-),女,中国黑龙江人,硕士,讲师,从事文学和教学法研究。

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历史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引进西方的进步思想、开启民智,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社科和文学作品,对于传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起了巨大作用,由此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白话文是文化民众化的一种表现,白话文使阅读变得更加容易、阅读量增大,这样不但可以传播更多思想和知识、提升民众素质,也可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白话文运动倡导语言文字的改革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汉语中的拼音、书写等规则的

制定和实施,对汉语言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白话文的推广始于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近六千字的《文学改良刍议》和2月陈独秀发表在该刊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以及紧接着在该刊上胡适发表的《白话诗八首》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读者们对使用白话文的讨论,但影响范围有限,白话文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和重视还要归功于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推进,钱玄同不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上都无愧是白话文阵营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翻译了外国小说100多种的林纾,面对白话文的倡导,他写出了《论古文之不当废》,由于林纾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公开发表文章反对废除古文,因此他被视为是白话文运动反对阵营的代表,也因此林纾对白话文推广起的作用也一直一直被忽视。本文拟以两个阵营的代表人物钱玄同和林纾为例来客观阐述那个年代的前辈们为唤醒民智、为传播先进文化和思想、为中国的觉醒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2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钱玄同生于1887年,他出生时父亲钱振常已经62岁了。钱振常是同治时期的进士,后辞官以教书为业。钱玄同从小受教于父,从年迈的父亲那里他接受了不太健康的身体和正统的教育。钱玄同一直体弱多病,这当然也与他不爱运动有关,病痛一直困扰和折磨着钱玄同,从早年留学时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等病症,也和他性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一位常年受病症困扰的人是很难总保持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太健康身体和不太完美的性格并没有影响钱玄同拥有高尚的学术品质和人格。有人说钱玄同善变,钱玄同自己也如是说,他还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了一下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善变”:从尊清到排满,从复古到反传统,从主张保存汉字、极端排斥用拼音替代国语到废除汉字改用拼音论,从主张遵从古礼到废弃古……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好几次,钱玄同引用梁启超的话“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宣战”来自嘲。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追溯钱玄同每次思想变化的原因,可以发现他是顺应历史的变化、与时俱进的,都和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钱玄同从尊清保皇到排满反清就是他在1903年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后来成为他老师的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产生的思想变化,他认识到“二百年以来满廷之割宰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1]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对于满清朝廷腐败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钱玄同从复古到反传统也体现他对现实的不满,想改良社会的质朴愿望。袁世凯复辟、孔学及儒学被复辟分子利用误导舆论、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等种种现实都促使钱玄同思想起了变化,他转向了批判儒学传统,响应《新青年》的号召同封建礼教做斗争,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

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早在1904年,钱玄同在浙江湖州创办《湖州白话报》,用白话的语言记录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旨在唤醒大众在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同时要关心国家大事,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这一目标尤其在该报的《社说》栏目中有明显的体现。而此时距离《新青年》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还有13年,可以说钱玄同对于白话文的重要性是很具前瞻性的。

新文化运动始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得到陈独秀的热烈响应,紧接着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刊出6封致陈独秀的信以呼应文学革命。在信中他提出了拥护使用白话文、提倡学习世界语、改良应用文的十三点建议:如使用标点符号、统一数字表述、改印刷直排为横排等,都是后来成为了现实的前瞻性建议。陈独秀、胡适等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和推广使用白话文,但却是钱玄同这位音韵文字学大师从专业的角度提供了理论依据。钱玄同提出废除文言文的理论原因:文字产生的时候是文言一致的。他认为古人造字时语言和文字必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语音不同,则文字各异,即“字随音变”。钱玄同从孔子、庄子、韩非子等古人的文章中以大量例证阐明他们的文章在当代人读起来是多么的拗口难懂,然而他们使用的语言就是当时的“白话”,当时人们就是那样讲话的,钱玄同的观点正名了白话的历史地位,但也遭到了质疑,有人认为中国汉字从象形文字开始就是以“形”为中心的,钱玄同认为中国汉字多主音不主形,汉字构造上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大阶段,从这“六书”发生的次序来看,汉字是从“象形”到“表意”,再从“表意”到“表音”,等到“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时,这便离拼音“只差一间了”^[2]。钱玄同通过对汉字构造的历史考察,从学理上表明汉字“离形就音”的趋势。钱玄同也分析了文言分离的原因,他认为是等级制度造成的,无论做什么事,贵族总想要与平民区分开来,做文章也是如此,他们口中说的是大白话,但落在笔头就摆起架子用文言文了,以此来显示与平民的不同^[3]。

汉字的发展由形到音、由繁到简的趋势是很多学者的共识,自晚清时起,便有很多有识之士就文字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实践,其代表人物如沈学、卢戾章、劳乃宣、王照等,他们的主张的共同点是:“中国该有拼音文字”。1918年3月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指出改汉字为拼音的种种困难,并主张废除汉文,绕过拼音,直接过渡到世界语。但是1920年以后,钱玄同认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这种理想太高,觉得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了,钱玄同提供罗马字拼音与他提倡白话文学几乎是同步的。1917年钱玄同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致力于国语运动,1919年他兼做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开始了国语、国

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的制作推行、悉心筹划，长达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以钱玄同在提倡简化字方面做出的努力可窥其功绩一斑：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倡导汉字简化旨在教化民众、普及文化，他提出了具体的八条简化规则：将多笔画的字删减；采用草书或稍稍修改的草书；仅保留多笔画字的一部分；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简单的几笔替代；采用古体；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别造一个简体字；假借他字，这些规则对于汉语言后来的简体字编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实践贡献也是巨大的，如果没有他与刘半农合演的“双簧”，没有他以“王敬轩”迂腐遗老的口吻写出的针对《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的挑衅性书信，辅以刘半农《新青年》记者身份的积极“对怼”，也就没有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蓬勃之势，钱玄同以深厚的旧学功底撰写“王敬轩”的公开信，将守旧派文辞模仿得惟妙惟肖，树立了经典的批判靶子；刘半农以犀利泼辣的文笔于嬉笑怒骂中，将封建卫道士们的迂腐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阐述了文学革命观点。中国近代史对“双簧信”作用的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二是显示了《新青年》同人倡导新文学的信心；三是引起了新文学倡导者与保守派文人的论战。在钱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青年》自1918年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便完全用白话做文章了^[4]。也是在钱玄同的鼓励和督促下，才有了白话文的第一篇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5]。

钱玄同是在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中觉悟得较早、较为彻底的知识分子，他的很多言论都带给人们启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对汉语言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要求打破旧秩序、建立新规则用全新的思想、方法、工具教育青年和后代的做法贯穿了他终生的学术活动。钱玄同语言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发展方向的，他也因此而受到后人的称赞和怀念。

3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我们以钱玄同先生为例看到了在新文化运动中来自白话文阵营对汉语言建构的积极影响，我们再探讨一下反对阵营对白话文的态度和影响，林纾是这些古文卫道士的典型代表。

无论从翻译作品数量、种类还是影响力来说，林纾先生的译作对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都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林纾先生从46岁开始翻译第一部作品《茶花女遗事》起，便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后他每年都会有4至5部翻译作品问世，这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林译作品数量和种类，有几种统计数据，各不相同。笔者选取郑振铎先生统计的数据：成书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种……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

品，共有九十三种，其次为法国，共有二十五种，再次为美国，共有十九种，再次为俄国，此外则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各国各得一两种^[6]。由此可见林纾先生译作涉及的国家范围之广以及数量上的高产都非一般译者所能比肩。林纾先生的译作带动和影响了很多学者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而他们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对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纾先生的白话诗文也对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晚清到林纾晚年，林纾始终坚持白话诗文的写作，大都发表在报纸上，只是在五四新文化论战后，很少公开发表了。这些译作和诗作在传播思想的同时，语言本身也体现了作者思想上的变化。因此，通过对于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林纾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下语言建构的积极助力心态。

林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信手拈来，译文简洁生动、意象鲜明，而他的声望又为他聚揽了大批读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钱钟书等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力军都有一段林译小说痴迷期。即使林纾本人是古文的忠实捍卫者，他的译文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钱钟书曾说：林纾在翻译小说时，使用的是一种“较通俗、较随意、富于弹性的文言”^[7]。因此，林纾作品的受众者也不仅限于古文读者。或许有些人会耿耿于怀于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古文卫道之事，其实林纾只是认为古文不可以全废。他一生尊古崇古，主张古文和白话文可以并存，白话文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7]。林纾并不反对白话文，还写过不少白话诗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推广和使用白话文，林纾这位号称是“古文最后守夜人”的古文大家也如上文钱钟书先生提到的那样，使用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言进行翻译，这无疑是对白话文的推广起了一定作用，而林纾对于五四前后语言建构更重要的影响是林译小说吸引和鼓舞了一批重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钱钟书、冰心等，这些作者的译作和创作都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

林纾是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林译小说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助力提升了小说在国内的地位，其读者群里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知名学者。周作人曾经是林译小说的忠实读者，他也曾模仿过林纾的翻译，他曾经在自己的译作《点滴》的序言中说过：“我的翻译受林琴南（林纾）先生的影响很大”^[8]。鲁迅也曾对林译小说爱不释手，当时他留学日本，只要林译小说一经出版并传到日本，鲁迅便会买来读。1904年，当鲁迅从朋友那里拿到林纾的《黑奴吁天录》译本时，竟然在一天之内就读完了^[9]。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气息对郭沫若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也始于他读林纾翻译的Joan Haste《迎茵小传》。钱钟书先生在年仅11岁时便被林译小说所吸引，林纾的译作给他开启了一片新天地^[10]。冰心先生也自林纾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迷上林译小

说,开始阅读西方文学。

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接受用白话文的过程中也是磕磕碰碰、一路试探走过来的,他们也要纠结是文言,还是白话?还是文言中参用白话?更何况是开始做翻译时已经是46岁的林纾先生,他终生读古文、精古文,根深蒂固的阅读和书写习惯、对古文的深切热爱使他不可能用纯白话文进行书写。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时,也曾感慨道:“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1]。这里的“俗语”便是指白话文,当时梁启超才30岁,做出从文言到白话文的改变都觉得困难,我们更应理解林纾的心境。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采用文言简捷便当,一挥而就;采用白话反而劳神费心,‘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2]。因此,林纾先生能够做到用钱钟书所描述的“较通俗、较随意、富于弹性的文言”已经实属不易,当然这种不易更多是心理上的,毕竟在文笔操作上,林纾还是游刃有余的。

但受林纾先生影响的晚辈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都正值青年时期,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我们以周作人为例来探究一下林纾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接受使用白话文的大致历程。1920年,周氏在为自己翻译的近代名家短篇小说集《点滴》写的译序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〇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生的讲论,又发生不少变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才用口语体”^[3]。《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周作人是顺应历史环境的号召,开始使用白话文做文章,而那时林纾已经67岁了,差不多可以说是终生使用古文了,难以舍弃文言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周作人的翻译活动很明显是受到林纾先生影响的,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是林纾先生的译作内容还是使用的语言影响了周作人,不过另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些启示。1926年,周作人在《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中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虽林琴南的礼教气与反动的态度终是很可嫌恶,他的拟古的文章也时时成为恶札,容易教坏青年”^[4]。这段话表明当时翻译界正在兴起,严复、林纾、梁启超三人的作品最流行,这三人的翻译内容明显不同的,严复的译作以《天演论》为代表,政论性的,梁启超的译作以《十五小豪杰》开科学小说中译之先河,而林译小说充满了浪漫意义气息,内容丰富,涉及诸多主题,周作人最喜看林译小说,而且是当时所出的所有册都读过,根据这三位译者的译作区别,首先吸引周作

人的应该是内容,因为三人的翻译均是使用的文言文,梁启超的译作还部分掺杂了白话文,因此语言上无太大差别。周作人还提到“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这里可以看出林纾的译作不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吸引了周作人。尽管周作人一生中每每提到林纾时,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正如这段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最初对林纾译作的喜爱,也有他认为林纾文章为“恶札”的时候,但不可否认,林纾译作对周作人踏上外国文学翻译之路的引领作用。

我们再看看同时期林纾的白话文使用情况。受戊戌变法影响,报纸日渐兴盛,旨在开放言论、传播思想,由于报纸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因此报纸上适宜使用白话文,晚清白话文运动影响越来越大,林纾便是受影响的学者之一。从1896到1913年间,林纾发表了大量的白话诗,如《闽中新乐府》、《白话道情》,还有在北京《平报》的《讽喻新乐府》专栏发表的共计130首,这些白话诗体诗歌主要讽刺时政^[5]。林纾写了这么多白话诗,为什么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与白话文阵营对立呢?或许我们可以在他写给自己的侄子林仲易的信中找到写线索:“且胡适之经余指斥,而尚以诃词加我。本不必吹吹与辩,张生不平,以文抵御,下半余改为游戏之文,如方朔之解嘲,以博阅者一笑……”^[6],在林纾看来,他的白话文只是“游戏之作”,写来只是为了“以博阅者一笑”。在林纾心中,白话文的地位远没有古文崇高。林纾是古文大家,“每出文集,行销以万计”^[8]林纾从他创作的200多篇古文中仅仅选出了159篇编入《畏庐文钞》,可见林纾对于古文文章的态度之严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林译小说都是文言文的,而非白话文的。林纾一直坚持文言文和白话文并用,只是使用的文体不同、功用不同。林纾用白话文主要是创作诗歌,发表在报纸上,目标读者是普通大众,白话文能更好地被接受;使用文言文写文章、做翻译,目标读者大多是学者或学生,对文言文的接受程度比较高,林纾的本意是希望两者能够并存,要让他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自己忠爱的古文诀别,林纾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4 结语

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阵营和反对阵营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进步思想总要与保守思潮进行正面交锋,我们欣赏以钱玄同等前辈们的开明思想和勇于实践的拼搏精神,我们也应该理解林纾等文言文守卫者的立场,理解他们对文化精粹的眷恋。双方阵营的都为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向前的,今人用今语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向为汉语言建构做出自己贡献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前辈们致敬。

参考文献

- [1]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0—111.
- [2]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1—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6.

- [3] 王丽媛. 钱玄同对国语运动的倡导与实践[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2: 24.
- [4] 宋平明. 重新认识钱玄同[J]. 江淮文史. 2019(5): 159-168.
- [5] 耿宝强. 钱玄同、刘半农“双簧信”作用再认识[J]. 齐鲁学刊. 2015(4): 137-141.
- [6] 钱钟书等著. 林纾的翻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9.
- [7] 朱晓慧, 庄恒恺编著. 林纾——近代中国译界泰斗[M]. 福建: 人民出版社, 2016: 91, 126.
- [8] 周作人辑译. 点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20: 10.
- [9] 姚锡佩. 鲁迅采撷美国文化的价值取向[J]. 鲁迅研究月刊. 1991(11): 52-61.
- [10] 钱钟书等著. 林译小说丛书——林纾的翻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2.
- [11] 梁启超著. 沈鹏等主编. 梁启超全集·卷18: 十五小豪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303.
- [12] 陈平原.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58.
- [13] 周作人著. 罗新璋, 陈应年主编. 翻译论集: 空大鼓·序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441.
- [14] 周作人著. 赵家璧主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七集——我学国文的经验[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35: 204.
- [15] 张驰. 林纾语体观念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18, 37.
- [16] 李家骥, 李茂肃, 薛祥生整理. 林纾诗文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335.